

国务委员刘延东会见北京论坛（2008）参会代表

国务委员刘延东 11 月 7 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出席“北京论坛（2008）”的部分代表。刘延东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最良好的祝愿。

在会见中，刘延东指出：“北京论坛已经举办了五届，先后有 2100 多名各国的专家学者和校长参加北京论坛。我觉得这个论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是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作为论坛的主题非常好。在这里能够超越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和谐交融、互通有无。在这个论坛上，各国学者还就全球各个国家所关注的共性问题进行思想交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维，也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果。特别是，论坛期间还举行大学校长圆桌会议，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所以今天见到各位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北京论坛，今后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刘延东同时还指出：“北京论坛在五年前就提出了‘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个主题，表现了北京论坛的远见，因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对我们现在的世界非常重要。追求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当代，和谐观念可以成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不同文化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价值标准。”

最后刘延东预祝北京论坛圆满成功，并感谢各位多年来对论坛的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

（供稿：北京论坛秘书处）

北京论坛(2008)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

2008年11月7日上午，第五届北京论坛——北京论坛（2008）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本届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以“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为副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多名专家学者在历史、艺术、国际关系、奥林匹克、高等教育、环境科学等六个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罗豪才，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利民，韩国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韩国SK集团副董事长崔再源，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默罕·穆那辛何（Mohan Munasinghe）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Hiroshi Komiyama）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及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哈里·托马斯·狄金森（Harry T. Dickinson）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校长李长茂教授，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教授主持。

北京论坛创办于2004年，是经中国国务院和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市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北京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总主题，每年举办一次。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因有重要公务未能出席开幕式，他向大会发来书面致辞。韩启德向光临论坛的各位嘉宾和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对北京论坛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在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更加紧迫地面临着全球性文化价值重建的问题。作为学者和教育者，不仅要关怀本民族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从而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他祝愿北京论坛在此过程中能够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为人类

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代表北京市政府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表示，北京论坛创办伊始就以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为己任，倡导“文明产生力量、和谐带来兴旺”的文化理念。五年以来，北京论坛影响日益扩大，声望逐渐升高，社会作用日益显现，既促进了海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又提升了北京市学术交流的水平和品位，还为北京市文化建设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仅如此，北京论坛还高度关注奥运话题，与会的专家学者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注入了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充分展示了北京独特的人文魅力和文化底蕴。

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女士在致辞中表示，五年来的实践证明，北京论坛作为辐射面广、影响深远、规格高、水准高的世界级学术会议，为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及促进学术进步、扩大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年来，以大学校长圆桌会议为载体，北京论坛为中外大学领导者创造了定期会面的多边交流机制，在促进全球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大学之间广泛交流思想、围绕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以及提供有利于全球高等教育健康蓬勃发展的新思想和观点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创举得到了国际高等教育界的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

韩国 SK 集团副董事长崔再源先生在致辞中谈到，北京论坛正日益成为领袖性的论坛，为亚洲和全世界都提供了一个交流智慧与思想的平台。论坛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开展活跃而多元化的讨论，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表示，SK 集团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大力支持北京论坛的发展，为全球的专家学者搭建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有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代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对北京论坛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说，历经五年的发展，北京论坛已经成为国际人文社科领域高水准的国际学术盛会，成为各国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许校长谈到，北京大学作为北京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在推动世界多元理解与和谐共处的进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北京论坛在过去的几年中不仅收获了许多思想深刻的学术见地，更重要的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使不同国家

的学者相互倾听、相互交流的氛围。许智宏指出，在当今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有助于激发新的思路碰撞，打开富有创造性的空间。

大会主旨报告环节，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默罕·穆那辛何（Mohan Munasinghe）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Hiroshi Komiyama）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及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哈里·托马斯·狄金森（Harry T. Dickinson）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分别作了题为“直面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应用”、“文明和谐发展与大学的角色”、“历史、学术与社会进步”、“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的演讲。主旨报告环节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教授主持。

生态文明：环境、能源与社会进步

“北京论坛（2008）”环境分论坛简报（一）

2008年11月7日下午，北京论坛“生态文明：环境、能源与社会进步”分论坛第一场报告会在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四季厅举行。会议分上、下两个半场，论坛由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和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主持，来自中国、日本、美国、荷兰、德国等国家的学者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张远航教授作为分论坛主席首先致辞。他认为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传统的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必须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态文明的可持续道路，选择生态文明既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也是对整个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做了题为“走向生态文明”的报告。他在明晰发展、社会、人类文明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大基本矛盾：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对财富公平分配追求的无限性与社会秩序供给的有限性；并表现为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与社会安定三大危机，他提出了中国解决上述危机的基本思路。

中国科学院符淙斌、艾丽坤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亚洲与气候变化”，认为随着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亚洲的水资源、土地利用、大气污染等问题已经影响到区域乃至全球环境变化，环境恶化造成的资源短缺将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阻力。同时，大规模地表覆盖的变化，以及大量气溶胶排放，都对局域/区域气候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以区域集成为基础的科学研究正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热点。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教授做了“中国应对人类发展做出的绿色贡献”的报告，他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议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主要有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减少贫困人口等方面，他认为现在正经历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

业革命时期，应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中国做出绿色贡献既是以大国态度应对和担当世界性绿色责任的实现方式，也是中国面向 21 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相匹配的世界形象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体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一个行动”的主题。

日本早稻田大学 Kenji Horiguchi 教授做了“经济增长与污染规制：从日本经验看规制市场经济体制”报告。他回顾了上世纪 60 年代的“日本奇迹”及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介绍日本为此付出的环境健康代价及采取的相应措施。他认为现在已进入了生物世纪，经济发展模式应区别于传统的物理世纪和化学世纪。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Krik Smith 在其报告“大气污染控制与健康、气候的双赢”中讨论了甲烷及农村能源问题。他指出甲烷对于全球变暖及平流层臭氧的增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关注二氧化碳的同时应该对甲烷给予更多的重视。在农村能源问题上，他分析了农村因为使用生物燃料导致的健康问题，以及改善炉子技术对于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意义，并探讨了推广新炉子的可能性方案。

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的 Bert Brunekreef 教授在其题为“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从局地到全球”的演讲中列举了伦敦、珠三角、荷兰及欧洲等不同区域及尺度的大气污染事故案例，展示了对大气污染物尤其是细粒子的健康效应的研究成果。他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气污染对于人体健康有着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应给予生物质燃烧更多的关注。

复旦大学教授陈秉衡发表了题为“更新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的演讲。她指出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距离 WHO 的“空气质量指引”的标准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同时中国的空气质量尽管已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污染水平。中国应该尽快提高空气质量指标，需要更为完善的流行病学研究支持。

最后，北京大学朱彤教授在“2008 奥运会北京空气污染控制：科学与健康效应”中详细介绍了北京及其周边大气环境观测项目的研究及其成果。从区域角度研究了大气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提出了区域联合控制的政策建议并被政府采纳，在奥运期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在奥运会期间也对大气污染的健康效应进行了研究。

生态文明：环境、能源与社会进步

北京论坛（2008）环境分论坛简报（二）

2008年11月8日上午，北京论坛环境分论坛第二场报告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张世秋教授主持了会议。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学者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美国杜克大学的 Kenneth H. Reckhow 教授做了题为“改善水质评估与预测的概率方法”的演讲。他以①基于贝叶斯理论的水质预测模型、②多层模型评估农业对水质影响、③利用专家判断和数据预测酸沉降对鱼类的影响、④城市化对径流和水生态系统的影响等四个研究案例，阐述了概率方法（贝叶斯理论与多层模型等）在环境管理与决策中的广泛应用前景。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Daniel P. Loucks 教授演讲的主题是“为可持续生计管理水资源”。Loucks 教授运用大量生动翔实的事例和图片，描述了当前世界水管理面临的诸多挑战，其中强调了气候变化对人类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巨大威胁。随后，他以也门、利比亚、死海、土耳其-伊拉克以及北美五大湖等具体的案例阐述了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具体内容。最后 Loucks 教授指出，人类应该综合处理面临的危机，从工程技术、改变个人习惯、加强交流和沟通、进行全球合作等角度，共同努力为可持续生计管理水资源。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研究员主要讨论“中国转型时期的水问题——管理和政策”。他从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水问题、中国的水管理体系、中国水政策改革及障碍、中国水管理良治措施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王毅认为，中国水管理的关键在于采取综合管理的途径，强化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流域综合管理（IWRM/IRBM）；同时，要对水污染控制优先采取行动。

越南河内大学的 Chu Van Ngoi 先生主要介绍了越南的山体滑坡现状、原因以及防治措施。他认为，人类活动，如采矿等，是造成山体滑坡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为了减

少滑坡等灾害的发生，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评估。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喜马拉雅-印度-西藏冰川的快速消融情况。他认为，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已经足以把地球的气候系统推到阈值之外，为了赢得宝贵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人类必须采取行动。为此，Ramanathan 教授提出了减缓冰川消融进程的 Surya 计划（Project Surya），其中对温室气体和大气棕色云中的黑炭控制给予了同等的关注。

日本东京大学的 Nakajima Teruyuki 教授就人类活动与地球气候变化的联系发表了演讲。他认为，尽管目前的观测和评价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气溶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确实巨大，它能从改变地球辐射平衡、云层以及降水等多个方面影响气候系统。Teruyuki 教授提出，为了减少研究工作中的不确定性，今后应努力提高云层和气溶胶模拟的精度、加强地面数据和卫星数据的综合分析。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李俊峰教授重点讨论了低碳经济。他认为，低碳经济将是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是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已经超越科学的范畴，而上升为一个政治命题。他断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会成为继《联合国宪章》和《关贸总协定》之后规制世界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文件。据此，他指出，中国应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契机，为国家和民族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姜克隽教授在演讲中主要分析了中国的能源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和减排成本。他利用 IPAC 模型组对中国 205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景进行了模拟，分析了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成本，以及实现减排所需的技术。他强调，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快速增加，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 2005 年增加一倍以上。但是，如果采取严格的措施，中国也有很大的机会在 2020 年之后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下来。

生态文明：环境、能源与社会进步

北京论坛（2008）环境分论坛简报（三）

2008年11月8日下午，北京论坛环境分论坛第三场报告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继续举行。会议分上、下半场，分别由北京大学朱彤教授和张远航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美国、德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学者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来自美国爱荷华大学的 Gregory R. Carmichael 教授首先做了题为“从区域和全球角度看大城市空气污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大城市在满足人们的经济、文化需求的同时，其所产生的大气污染也会带来区域性和全球性的问题。他列举了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大量增加，以及气溶胶在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例子。报告详尽地论述了大城市对区域和全球污染的影响，指出这种影响是一个广泛性的问题，需要采取协作的政策，并呼吁人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陈林同学代替石广玉研究员做了题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粗颗粒气溶胶浓度明显下降”的报告。他主要介绍了他所在的研究组利用光学粒子计数器对北京市近几年来大气颗粒物的粒度及浓度的变化的监测的情况，得出了“粗颗粒物的浓度有了明显降低而细颗粒物浓度没有明显下降”的结论，并将地形与风向、交通工具及建设项目的控制等列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教授以“珠三角大气观测项目与重点城市群污染控制项目”为题做了报告：通过对珠三角地区大气的观测及研究，获得了相应的监测数据，了解了污染物的分布情况与空气污染水平，其研究结果对建立污染物的控制政策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张教授最后指出，珠三角大气观测项目是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创新的实例，是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用的实践。

德国的 Andreas Wahner 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区域污染与全球变化”。报告主要涉及了大气氧化的转移及其量化以及二次有机气溶胶的形态问题。他通过化学反应的机理和

模型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描述，并将模型计算结果与实测值进行了对比分析。

在简短的讨论时间里，与会的专家和学者们就大型城市在大气、水等不同领域的污染控制问题，如何将环境模型得到的数据与实践相结合，国际合作中的沟通与交流问题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经过短暂的休息，报告会继续进行。美国夏威夷大学的 Peter Englert 教授作了题为“经济增长、创新与气候减缓”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描述了一个经济和社会支持系统用以加强商业中的创新，并且提出了一个将气候减缓纳入创新过程中的机制。

北京大学教授胡建信随后做了题为“中国 HCFC 淘汰中战略与气候变化效应”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介绍了中国 HCFC 类物质的控制现状，指出 HCFC 类物质的控制与控制温室气体存在密切的联系。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胡建信教授提出了可能的控制措施，并从替代技术的选择及各种措施所能实现的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他对中国 HCFC 的淘汰做了情景分析，并相信中国在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 Sharifah Munirah Alatas 博士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全球淡水危机和私有化：发展与 Wittfogel 理论”的报告。她在报告中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例指出：我们对于全球淡水危机问题不能仅从科学的角度，还需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分析，水的私有化在发展中国家中并不能真正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因而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正确途径。最后，她强调，淡水危机问题会在今后越来越突出，需要多方合作解决。

最后，来自越南国立大学的副教授 Nguyen Thi Ha 做了题为“越南可再生能源潜力评估”的报告。她在报告中介绍了越南现在的能源消耗情况，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情况；同时还介绍了越南基于安全考虑的能源政策和措施，以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所面临的挑战与障碍。

生态文明：环境、能源与社会进步

北京论坛（2008）环境分论坛简报（四）

2008年11月9日上午，北京论坛环境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继续举行。这是分论坛的第四场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胡建信教授主持了报告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和专家出席了会议。

美国华盛顿 Schiff 律师事务所的 Gearold L. Knowles 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能源政策：迈向生态文明”的报告。他认为，能源政策是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基石。当前面临的能源问题，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能够从中受益。随后，他详细介绍了美国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等方面采取的政策和措施。Knowles 先生建议，中国在能源管理方面，应当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协调。

澳大利亚 La Trobe 大学的 Harry Clarke 教授所做的报告题目是“从经济角度看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战略问题”。他首先将博弈论引入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协定的研究视野，提出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气候变化政策模型。他还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对该模型做了进一步的阐述。Clarke 教授在最后强调指出，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每个国家都应当替别的国家着想，而不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今天的第三位报告人是北京大学校友、美国德克萨斯州 A&M 大学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研究所（ISTPP）的刘新胜教授。他的报告题目是“应对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问题、关注与中美政策”。刘教授认为，全球变暖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一个政策问题。从对科学家和美国公众所做的调查以及对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的 SCI 论文、美国报纸新闻和国会文件等的统计分析，刘教授描述了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作为公共政策问题在美国受关注的发展历程。相应的，通过对中国《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公报的统计分析，

刘教授指出，在中国，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关注。最后，他对中美两国的全球变暖政策走向做出了展望。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教授是分论坛的最后一位报告人。她的报告题目是“应对气候变化与区域污染：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张教授简要介绍了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和环境问题，特别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环境与经济相适应、兼顾效率与公平、解决污染问题与保证民众健康以及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国际压力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之后，她对中国的宏观政策改革提出了建议。她认为，应该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跨越式的发展道路，综合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会议即将圆满结束时，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远航院长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简单回顾了学院的历史，介绍了学院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所做的努力。随后，张院长代表学院邀请 Ramanathan 等 7 位学者担任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并且向他们颁发了证书。

最后，张世秋教授代表生态文明分论坛组委会做了总结发言。她在发言中对国内外学者的出席、学生的参与以及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对学院聘请的 7 位国际咨询委员表示祝贺，期望今后再有机会进行学术交流，并鼓励年轻一代担负起领导的重任。

分论坛在热烈和谐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

“北京论坛（2008）”历史分论坛简报（一）

11月7日，2008年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和精彩纷呈的首日讨论。

在开幕式上，英国皇家历史协会及大英历史学会副主席、爱丁堡大学教授 Harry T. Dickinson 作为四位主旨报告人之一发表了演讲。演讲以“历史、学术和社会进步”为题，从历史学的角度解析文明的发展与繁荣。主旨报告由三部分组成：一、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二、政治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三、教育在文明发展与繁荣中的重要作用。关于文明的发展，Dickinson 教授首先辨明专业的历史思维与公众的历史情趣之间的区别。针对美国等国政要自诩民主制度的完美，Dickinson 教授以历史与现实的具体事例证明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超过一百年，并且当今的民主也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他同样驳斥民主政治产生经济繁荣的断言，在历史中恢复政治民主与经济繁荣之间的真实关系：前者根源于后者。两者之间甚至不存在必然联系，经济繁荣同样出现在非西方民主的制度中，Dickinson 教授援引中国、新加坡等国的实例予以论证。在他看来，无论繁荣产生于何种体制之下，教育都功不可没。

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二楼会议厅，历史系分论坛拉开帷幕。第一场学术报告与讨论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主持。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彭慕兰教授比较美国与中国的水利项目，从经济、环境和标志性建设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释。他将中国的水利工程总结为两种类型：北部地区传统的灌溉和防洪工程，以及西部地区现代的水利发电工程。前者是历史的遗产，体现渐进的发展观；后者与美国的水利工程项目类似，展示国家的实力。在经济上，工业用水的效率高于农业用水，现代的水利工程建设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水利工程引发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尤其严重；中央政府而

非地方主持建造水利工程，以宏大的规模彰显民族情感。结合地下水过度开采的问题，彭慕兰在结论中指出：由于中国的水利工程产生的农业生产率比美国高，供养人口比美国多，所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之间更难抉择。

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教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保护问题。她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进行着挑战，但是并未终结国家主权；并进一步指明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主权的出路，即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与多数学者关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不同，爱丁堡大学的 Thomas Alvin Jackson 教授研究 1800-1920 年间不列颠-爱尔兰联盟长期维持的多种原因。他的研究思路是：虽然自联盟建立以来，民族、信仰、利益等冲突不断出现，甚至南部爱尔兰最终脱离，但是联盟却始终存在；君主制度、联盟军队、政府参与率上升以及交通、通讯等的普及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原因。

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主持了历史分论坛第二场会议。来自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 Gilles Pecout 教授分析了 19 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村人口现代化和政治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他首先交代使用“现代化”概念的理由，现代化虽然具有片面宣扬“进步”的嫌疑，但最恰当地表达了 19 世纪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在演讲中，他强调了 1830 年以后法国乡村社会对政治文化的适应过程、对公民身份的积极认同和以和平的政治方式取代冲突等。通过比较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他探究政府和乡村精英在农村政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演讲还涉及社会力量与政治影响之间的关系和乡村精英的三大类别。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挖掘美国建国者心目中的“人民”，它被赋予两种既联系又矛盾的内涵。作为一个道德整体，“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人民主权”原则上确立国家的正当性；作为现实政治世界中的“人民”，居住分散、利益多样，缺乏行使政治权力的素质和能力。凭借对“人民”的双重定位，美国建立了改良后的民主代议制度。

拉筹伯大学的 Pranee Liampugtong 教授以泰国清迈地区的妇女为例，介绍传统观念与生物医学知识之间的冲突，论述后者日益成为权威的趋势。

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

“北京论坛（2008）”历史分论坛简报（二）

11月8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迎来了大批尊贵的客人，刚参加了昨日于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北京论坛开幕式的各国学者在这里就“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展开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与探讨。论坛甲组的会议在上午九时准时召开，英杰交流中心的第一会议室内，来自国内的学者，与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同行们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自由地进行了学术交流，第一场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毅教授主持。

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的 Harry Dickinson 教授首先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1768-1848年间不列颠关于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论争。Dickinson 教授的发言对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发生在不列颠的围绕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左右两派的论战作了详细的阐述，并指出英国的民主制不是任一政治势力的胜利，而是不同政治派别经过长期的斗争与妥协达成的。Dickinson 教授的发言获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随后，复旦大学的黄洋教授以“雅典民主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为题做了发言，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地分析了雅典的民主，让在座的学者们深受启发，获益匪浅。黄洋教授提出，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应该从意识形态的标签中解放出来，可以更多地应用于对古代社会的分析研究上。

第三位发言的学者是来自法国里昂第三大学的 Jean-Francois Chanet 教授，Chanet 教授对有关欧洲军事占领的研究前景作了介绍，深入剖析了占领者角色的转换及其与被占领者的复杂关系，启发了与会者的深入思考。

接下来，会议进入了讨论阶段。学者们就三位教授的发言提出问题。会议在自由和

热烈的氛围中进行，短暂的讨论结束后是茶歇，与会者这时便有了更多机会私下交谈，英杰交流中心会议区内洋溢着清新而友好的学术交流气氛。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毅教授、法国的学者 Pierre Serna 与同样是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钱乘旦教授相继作了发言。前沿的学术研究、多领域的学术议题激发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不同的见解、自由的讨论充分体现着北京论坛促进各国学术交流的一大宗旨。

下午甲组会议的第二场开始，会议的前半部分由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彭小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的王立新教授与来自美国的学者 Thomas E. Buckley、Patrick Carey 就各自关于美国政治与宗教的相关研究分别作了精彩的发言。随后，在 Thomas E. Buckley 教授主持下，日本学者黑木保博教授、彭小瑜教授和来自美国普渡大学的 R. Douglas Hurt 教授分别就各自目前的研究作了详细介绍，与会学者们就发言者的演讲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

“北京论坛（2008）”历史分论坛简报（三）

11月8日，北京论坛历史分论坛继续着各方来宾的思维驰骋，众位学者在各自话题中展现了宽广的全球化视野与深刻的现实关怀。

上午乙组上半场的演讲与讨论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问题。长期以来从事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研究的华东政法大学李路曲教授，以新加坡为例，主要将后发展国家之间、后发展国家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比较，指明其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及发展目标；并将新加坡与中国的发展历程相比较，指出今天中国政治正处在以发展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阶段。随后进行报告的华南师范大学赵自勇教授，对新加坡的自由民主之路发表了看法。他首先提出了“新加坡将会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吗？”，这样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进而阐释了立足于新加坡历史条件与现阶段国情的政治发展特点，指出以西方标准评价新加坡式民主的不恰当。牛可先生主持的第一阶段讨论中，主要围绕赵自勇教授的发言展开，在座诸位学者参与了对民主概念与形式的讨论。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谢文庆教授最后就殖民体制之后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与其不同政见者的相关问题发表看法，指出了该地区政治发展的多样化。

第二阶段，布朗大学美洲种族和族群研究中心胡其瑜主任首先发言。他的发言以“革命后墨西哥仇华浪潮”为题，指出其对于墨西哥民主主义与国家建构的作用。北京大学董经胜教授以新引入中国学界的文武关系观念，探讨了智利后威权时期的政治发展。孙晓春教授的发言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解析了人民主权与现代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被接受、解读与应用。他认为一开始中国人对主要以卢梭观念为基础的人民主权概念存有

误读，历史上这样的思想起到了作用，但今天应避免继续的误解，此外卢梭概念本身具有局限性。

下午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李世安教授回顾了世界历史各时段的人权概念，归纳了其特点，并分析总结了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全球化趋势对人权概念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在其发言中，应用卡尔·波拉尼的双向运动解释框架，回顾了中国在过去六十年中所经历的转型，重点分析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目前中国已步入建设社会政策的时期，并将持续在社会公平等问题上取得进步。Jeffrey Wasserstrom 教授以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为例，将其与二十世纪初期在美国举行的世博会比较，指出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大型事件对城市身份界定的作用。随后由彭慕兰教授对以上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

王绍光教授主持了第二阶段的讨论。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陈勇教授以食物为切入点对美国历史进行了解析，并阐释了中餐在美国国家建构中的作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的刘军研究员在他的发言中探讨了公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各自的特点、有限性与无限性，及在历史解释中的应用。Rosenberg 教授介绍了大众消费在全球化环境下的转变，即从美国式的消费模式转化为具有世界各地地方性的消费模式，指出消费主义下的全球性互动。

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

“北京论坛（2008）”历史分论坛简报（四）

“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出版印刻的变化日益关注，使得学界对于中国出版的研究从古籍本身的研究引向了更深发展。”2008年11月8日北京论坛历史分论坛对印刷出版与传统国家建构的研究趋势进行了研讨。到会参与讨论的学者有：辛德勇教授、高桥智教授、贾二强教授、井上进教授、内庆田教授、牛大勇教授。

会议首先由名古屋大学的研究明代版刻的著名学者井上进发言。他就“明代前期出版的变迁与学术”这一主题，依据这个时期刊本的实物做了一个具体的探讨。井上先生提出明代前期出版业经历了一段显见的衰落。当时拥有最发达商业出版业的福建，也不过是形式上模仿元朝，印书的质量就明显衰落了。这种颓势在洪政年间得到了扭转，其中的显著变化是徽州版刻业的兴盛和北京书贾业的繁荣。出版业前期的衰微是和明代控制出版和阅读经学息息相关的。随着文学的兴盛，出版业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陕西师范大学的贾二强教授在其演讲“清顺治朝的御制注书与内府刻本”中，指出清代顺治朝内府刻书很有时代特点，种数不多，大多为御制御注，内容皆有关训诫，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亦表明顺治励精图治的初衷。

与前两位学者不同，来自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的高桥智教授，则对日本汉籍活字本的出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演讲题目是“日本庆长时期汉籍活字本出版的意义”。他在演讲中提出在日本流传的汉籍形式从写本到刊本的转变，写本文化也被刊本

文化所取代。文禄年间从朝鲜传来的活字印刷术，立刻被日本所采用。此后，围绕着活字技术在日本的兴盛，一些传统的中国古籍也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在此，高桥教授分别讨论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汉籍经典的刊行和版本价值，并阐述了汉籍活字出版对于东亚文化交流的意义。

经过短暂的茶歇，会议主席辛德勇先生在其“论所谓明铜活字印书于史初无征验——附论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的演讲中反驳了关于铜活字盛行于明代的传统观点。辛教授指出，明代一些活字印本上附有“活字铜板”或“铜板活字”的注记，并不是印刷史研究者所普遍认为的铜活字版的强有力证据，从“铜板法”在中国活字印刷史上技术变革意义上入手，提出所谓“铜板”只是表明存放活字的字板系铜所制作，而它与字钉材质本来毫不相干。比较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表明，明代盛行的金属活字印刷，应当是锡活字。

日本关西大学的内田庆市先生则针对于中国近代的报纸发表了“关于‘文裕堂’及其周边”的演讲，在文中探究了《循环日报》和“中华印务总局”的发展沿革和“文裕堂”的关系，认为“文裕堂”是《循环日报》内开设的中华印务总局的主管机关。并且对于《循环日报》和“文裕堂”的关系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

在随后的讨论中与会学者针对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贾二强教授和高桥智教授就日本古籍版本家刻和坊刻展开了讨论。各位先生还耐心地解答了现场同学的疑问。最后由会议主席辛教授宣布会议结束，本场讨论圆满接受。

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

“北京论坛（2008）历史分论坛简报（五）”

11月9日上午，北京论坛（2008）历史分论坛继续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进行，与会的各国学者就“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化”展开了更多的深入交流与探讨。上午9时，甲组的第三场会议于英杰交流中心第一会议室召开，本场会议由来自美国的著名学者 Patrick Carey 教授主持。

第一位发言者是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 Michele Fatica 教授，会上他对墨索里尼时期意中田园式外交关系的始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1930年到1937年，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展开过积极的亲密外交，以上海为基地，墨索里尼采取各种手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加强渗透、扩大影响，而这一时期，蒋介石政府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外交关系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Fatica 教授认为直到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田园式外交关系才开始破裂。Michele Fatica 教授的发言获得了当场学者和同学们的热烈掌声。

随后，甲组会议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田辰山教授以“两个‘文明’大故事，两个‘民主’大结构”为题比较了中西方的传统与现实政治结构，他提到：“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是‘场心’式的，和西方的‘一多二元’的结构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没有‘一’，而体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西方国家，上帝是绝对的主体，在其民主结构中包含至下而上的个体竞争体系和自上而下的主宰支配关系的秩序。”

发言结束后，与会者就两位学者的发言进行了自由而热烈的探讨。

11月9日北京论坛历史分论坛乙组的讨论焦点集中在现代化问题上。

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新生教授，主题是战后东亚发展主义政治。他回顾了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几种发展历程，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发展主义阶段，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为特点，技术官僚治国。在发展主义阶段，国家政权以经济增长确立合法性，赢得人民支持；同时，这种发展模式也有诸多缺点，如立法机构多为点缀，出现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在兴起的市民阶层推动下，进入精英主义的政治阶段。在之后的讨论中王新生教授热情回答了在场同学提出的问题。

为北大师生所熟悉的雷迅马教授随后就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相关话题展开演讲。他认为首先自由主义始终是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对之有传播至四海的使命感；由自由主义传统更新而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特别在六七十年代对现代化概念具有破坏作用，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新自由主义新理念又非常类似现代化观念；在发展目标上来说，即低成本的高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与现代化理论有非常类似的地方，最终两者的区别在于对市场和国家作用的理解上。

来自柬埔寨的 Thyda 女士以“吴哥时代高棉王国的国家建构”为题进行了讲演。问答阶段的气氛非常热烈，钱乘旦教授首先向雷迅马教授提问，涉及现阶段美国次贷危机由新自由主义造成，它所带来的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影响，以及奥巴马上台所倡导的变革的意义。接下来高毅教授问及新自由主义与现代化概念范围。对此雷迅马教授认为尽管新自由主义会有经济上不稳定的一些后果，但仍不会发生对现代化的回归，而是会继续强调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同时，现代化的一些前提性概念仍然存在，如政治变革将伴随经济发展而来。所以作为更大概念的现代化也并没有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董正华在随后的点评中谈到现代化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并区别了新形式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与讨论中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概念。牛可副教授也对通常概念中将现代化看做实实在在的过程，和演讲中将其作为理论的处理进行了分辨。

最后会议在活跃的交谈中圆满结束。至此，“北京论坛（2008）”历史分论坛也圆满

落下了帷幕。

12

11

7

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

“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简报（一）”

2008年11月7日下午，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学者针对“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发言和讨论，各位学者的基本观点如下：

北京论坛艺术分论坛负责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叶朗教授在题为“在文化交流中展示中华文明的普适价值”的发言中指出，人类文明的多元共存格局必然带来文化的差异。如果缺乏交流、沟通，往往会造成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隔膜和误解，甚至造成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隔膜和误解，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不仅要注重展示各自文明中最有特色的东西，而且要注意展示各自文明中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东西。中国文化中就有许多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有一种对生命的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还包含有强烈的和平意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界，要展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情调，展示普通老百姓的人生愿望和追求。总之，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要注重展示各自文明中体现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这样可以大大有助于在不同文明之间清除隔膜和误解，增进理解和认同，从而大大有助于在国际范围内构建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

印度孟买大学民间演艺学院院长帕拉喀什·坎杰，在其发言“艺术的超越和文明的

发展”中指出两个重要观点：其一，艺术与生命（社会）的关系，其二，艺术的普遍概念。艺术不仅是一种生活的表达，更是自然的，是代表人类的。艺术诞生于沟通的需要，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现在，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艺术是生命；另一种认为，艺术是为了艺术。在文明的每一次变化中，艺术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文明的精神和方式。艺术是灵魂的文明。

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教授在题为“交流：艺术的活力之源”的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基本要素离不开民族、技艺和审美。艺术是通过一定的技艺表现出本民族文化的审美理想。郑先生通过四个大的方面来谈艺术。一是艺术的民族性问题，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是当今世界走向和谐的基本要素。二是艺术的多样化问题，艺术的多样性是建立在多民族的基础之上，其多样性有两个层面：其一是艺术种类的多样性。其二是各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艺术的多样性不仅是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世界格局所决定的。三是艺术交流的形式。包括民族之间的艺术交流，不同艺术门类、不同学科之间的艺术交流，地域、流派和个人之间的艺术交流，其中民族之间的艺术交流包括东西方的艺术交流，中外民族间的艺术交流，中华民族内部的艺术交流和复合性交流（即中外民族的艺术交流与中华民族内部的交流融合在一起）。最后一个方面是艺术交流的意义，艺术是为了表达情感而产生的，也是为交流而产生的，是在交流中发展的，是在交流中实现其价值的。

来自维也纳大学艺术史论系的马尔蒂娜-皮帕教授认为，我们所关注的基于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是关于技术的发展、数字革命的手段以及一些政策和经济的改变。自 1980 年以来，历史发挥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这是因为文化气氛让过去对于现在时间来说越来越重要。过去的文化一直被禁止，直到 1980 年，华沙条约盟国和中国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将其变成今天我们的民族优越感。它的良好作用体现为投资建设时的声誉（尤其是在商品出口和旅游业方面）。就中国而言，要重新融入社会文化，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就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庆典。2008 年 8 月 8 日，中国向世界展示纸

张、油墨、活字印刷术、船舶建造、指南针等发明。中国携手这些古老的文明成就，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就有了无限的信心。此外，在演讲中，皮帕教授还提到，三维动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问题。

波士顿大学艺术史家弗莱德·克莱纳，在其发言中说到：我们列举了许多具有历史

12

11

7

代表性的艺术品，而每一件艺术品都拥有着它们深刻的内涵。在早期的文明时代，艺术品不仅是艺术品，它们还是交流的一项重要手段，蕴含着浓缩的信息，体现出当时社会与文化，展现了人类历史的辉煌。艺术是一切伟大文明的结晶，那些已离开我们几千年的伟大艺术家，如今他们仍能够通过他们的作品继续和我们保持交流。

福建师范大学中国音乐专家王耀华教授从四大方面来谈跨文化音乐比较学，即：一、跨文化音乐比较学的认识论基础；二、跨文化音乐比较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三、跨文化音乐比较学的现实社会基础；四、跨文化音乐比较学的特点。跨文化音乐比较学的“比较”不仅是指科学方法，更重要的是表示一种新的学科辩证思维方式。由表面上的异同之比过渡到辩证思维，这就是跨文化音乐比较的一个关键，也是跨文化音乐比较方法论的理论基础。运用这种辩证思维的观念，对世界各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其辩证关系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即历史实证主义、逻辑美学关系和科际整合关系。跨文化音乐比较学的学科建设，在当今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因为现今和平、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成为人类所必需具备的一种素养。

台南艺术大学美术史论教授徐小虎在其“艺术的永恒价值”中，试图探索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艺术。无论散文还是诗歌，无论视觉艺术中还是多媒体作品，无论表演艺术还是社会行为等等，一切艺术形式的产生，都源于人类的冲动。研究艺术可以发现，人的创作都在于体现自身，引起我们的观察，引起我们对情感和精神的理解，净化我们的

是那些往往超出一般性理解的东西，这些东西超越了简单言语交流。艺术的这种转化功能，使我们与艺术获得真正的相遇，然后需要一条可以打通人类经验的渠道，这是一个传递出明确而具有普遍价值的过程。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王镛教授，在“东西方艺术交流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指出人类渴望互相了解，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神往于遥远、陌生而新奇的异国事物。这就需要一种世界性语言，以便东西方不同民族的人们交流和对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1868-1940）曾经说过：“艺术是惟一的世界性语言。”这种世界性语言的对话，即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可以超越时代、地域、民族、宗教等藩篱，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东西方艺术本来属于异质的文化，从形式、技法、风格到审美观念都具有不同的时代、地域、民族、宗教等差异，仿佛是不同的地方语言。但归根结底，艺术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人类精神是相通的。艺术的超越性来源于人类精神的超越性，人类精神的超越性形成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正是这种普遍性价值使艺术拥有世界性语言的共同基础和内在结构，可以超越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宗教等差异进行交流。尤其作为视觉艺术的造型艺术，带有审美直观的性质，造型艺术的某些语汇不需要翻译就可以理解。在东西方艺术不同的形式后面，存在某些异质同构或同质异构的因素，这些因素彼此交流、沟通和互动，可以更新旧有的艺术样式和文明形态，生成新的艺术，新的文明。东方艺术或西方艺术借鉴外来艺术的因素，通常都是基于本土文化变革的需要，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而吸收、改造、同化了外来艺术的因素以后生成的艺术样式，往往比东方或西方本土旧有的艺术更加新颖、美妙而丰富，从而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形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世界艺术史上，许多事例都证明了东西方艺术交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

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

“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简报（二）

2008年11月8日上午，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学者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就“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就行了探讨。

波兰美术学家约瑟夫-格拉博斯基作为北京论坛艺术分论坛第三场首位学者，以“艺术的传播功能：对过去及多媒体时代艺术力量的观察”的报告，为我们展示了自己关于美术与艺术家的独到见解：自石器时代开始，美术品的视觉传播功能就开始为社会、宗教和政治服务，最终发展成为人类的美感服务。“艺术家”作为一个名词，从来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特殊词汇。在全球化时代，媒体的强势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一件上乘美术作品所理应拥有的明确作用，使美术品无法成为沟通和表达不同社会价值的手段。但有必要强调的是，无论站在传统还是现代意义的层面上，美术所发挥的作用都有助于我们当前社会的发展。

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彭吉象教授，在其“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发言中指出：从古至今，中国艺术涌现出了难以计数的杰出艺术家和不朽的艺术作品，并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形成了洋溢于我们民族一切优秀作品之中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也闪耀着举世瞩目、璀璨独特的光芒。中国艺

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如果说，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认识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认识的最高形式，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精神王国的两座高峰。架在这两座高峰之间的桥梁便是美学，哲学正是通过美学这一中介对艺术产生巨大影响。真善美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善就是伦理）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相比而言，西方美学和西方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

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美术学家丁宁，以“自然之爱：中国山水画的空间意蕴”为我们提供了一场印象深刻的视觉盛宴。流动在中国文化中的自然之爱几乎无所不在。哲学、诗歌、建筑中都有精彩而又独特的演绎。中国山水画尤其具体地表达了对自然的亲和、敬重、赞美与想象，体现了特殊的自然观念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山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的空间概念。面对和描绘山水实际上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精神之旅。真正不朽的山水画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模山范水，而意在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独特把握，赋予自然本身文化与审美的意义。中国艺术家所把握的田园风景的每一个特征都对应于人类心灵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山水画及其相类的空间表现不仅仅奠定了独特的审美格局和艺术气派，形成了久远而又强大的影响，而且内在蕴含的自然观以及艺术家对待自然的挚爱态度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为之思味与心仪。

“舞蹈艺术的超民族性和永恒价值”，是由北京舞蹈学院袁禾教授与众学者共同分享的话题，为所有的聆听者带来关于舞蹈艺术的思考和享受。袁禾教授指出，舞蹈作为艺术的一种，属于人体文化，是人类的一种语言。这种特殊的语言，从人类初期就成为被群体所认同、所运用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被现代人称之为“无声的言说”。人体动作构成的舞蹈能够直接展示生命的呼吸和运动，直接体现宇宙生命的状态。因此舞蹈也就比其他艺术更接近人类的原初状态，更能跨越历史时空、冲破种族隔膜而被全人类所共同理解和接受。舞蹈的艺术特征及其超民族性包括三个方面，即动态性、情感性和意象性。舞蹈语言的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即象形取意和虚拟象征。舞蹈能够从一幅画、一首诗、一段音乐、一纸笔墨中捕捉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动律、情感和意趣，它是人体的书法，流动的绘画，视觉的音乐，无言的诗歌。

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

“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简报（三）

11月8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艺术分论坛上，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美术学院的芭芭拉·塞勒斯·杨教授，就舞台表演问题，展开自己精彩的阐释。其发言“传播问题：演员训练、文化互动与身体”，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例子。文化交流是一个极其繁重、要求通过实践完成的系统。系统间所需的内在工作如此疏于留意，那些看不见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微妙压力，客观上成为不同的生理和感官刺激的来源。

山东大学前校长，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教授，在其“审美教育：使人成为的‘人’的教育”发言中，就中国教育中的美育问题阐发自己的观点。他就“应该如何看待审美教育”、“美育在社会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中应该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使人成为“人”的教育，在新的世纪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审美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审美教育（简称美育）是一种人的教育，是使人成为学会做人，学会生活，从而成为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人”的教育。曾教授还指出美育在当代还成为弘扬人文精神协调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渠道，并进一步充分认识审美教育在培养全面发展与人格健全的一代又一代新人中的重要作用。

“‘滑铁卢’意味着什么——跨文化、跨门类作品解读中的主体”是来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潘耀昌为我们带来的一个有趣而令人深思的话题。提到“滑铁卢”，这个词通常意味着惨遭失败，还包含对拿破仑的惋惜与同情。但是在英国情况却不同，人们的反应颇让人感到意外，“滑铁卢”似乎意味着国家的胜利，甚至包含对惠灵顿将军的敬意。看来“滑铁卢”的含义取决于使用者和接受者自己的身份和立场。由此观之，解读者的主体，也就是说由谁解读，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当今世界处于多元文化交汇和各种门类交叉融合的时代。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艺术品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接触。但是如何恰当理解它们避免各种误解，也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背景下，艺术的沟通、理解的可能性是个有待深究的复杂课题，它涉及“图像与词语”转换，即视觉表现与（文字）语言表达的关系，以及作者与受众的背景。潘教授主要强调了文化艺术理解中解读者主体的决定性作用。

吉林延边大学崔雄权教授，在其“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的发言中围绕著名的《潇湘八景图》，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化影响朝鲜的问题。北宋画家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大约在高丽仁宗至毅宗时期通过官方机构传到韩国，随即韩国相继出现大量的摹画。“潇湘八景”不只限于绘画，而且在诗歌，以及小说、清唱等多种文艺形式中也被反复使用着，成为韩国文人特殊的文化语码。“潇湘八景”文化语码是强势文化单向度流向弱势文化，而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侵入和渗透下，不得不认同和接受强势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一个鲜明例子。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的自我进取中，韩国文人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不断地在积累和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

“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简报（四）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松教授，在名为“跨过‘虎溪’——从视觉材料看中国宗教艺术的跨文化整合”的报告中，聚焦于明代成化元年（1465）宪宗皇帝朱见深所作的《一团和气图》，以此画为线索，进入南北朝至明清间千余年的历史情景中，梳理了这个时期丰富的相关视觉艺术材料，以图像材料勾画出三教关系史。这些材料包括造像碑、石窟、卷轴画、壁画、刊本等艺术形式，除儒释道三教并列造像外，还涉及有《白莲社图》（及《虎溪三笑图》）、《化胡经》（及《老君八十一化图》）、《三教会棋图》等不同的叙事图像。通过这些视觉图像，观察三教关系的起承转合，将艺术形式的变化与民间的普遍信仰、皇帝的个人兴趣、宗教的义理、社会的冲突诸方面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李爱国教授在“中国画的国际化”中指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画这门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体现着民族艺术精华，散发着民族智慧芳香的绘画艺术走向世界已经越发显示出其可能性与必然性。中国画的国际化是建立在人类审美情趣的共同性与差异的基础上，中国画的国际化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精

神，提高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研究、推动这一趋势的进行是十分必要的。从历史上看，被称为“中国风”的中国绘画除了对周边及东南亚有较强的影响，对西方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保持民族绘画特色，学习外来艺术，以西润中并不是填平中西绘画两座山峰之间的鸿沟，而是提升其各自的高度。艺术质量是国际化的关键。尽管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并不是所有民族的艺术都能进入世界优秀艺术宝库。

加拿大约克大学美术研究中心的尼尔·坦哈夫教授在题为“电子文化”的发言中指出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创新对于艺术和技术的发展都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创新的形式是这一切的根本所在。源于艺术和根植于文化现象的创意，对于每个人，包括科学家来说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艺术和数字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几近合一，以至于分析它们如何相互影响，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技术引导艺术的概念，认为技术发展带来艺术实践上的变化，具有历史和经验基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也给我们遗留下来一个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艺术品。

日本立命馆大学艺术科学家矢野桂司教授“数学化人文科学在日本美术与文化发展的问题及展望”为题，介绍了数字化人文中心的日本艺术和立命馆大学艺术研究中心（ACR）的未来发展计划。

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

“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简报（五）

通过“马蒂斯与远东艺术”这篇报告，美国塞顿-霍尔大学美术与音乐系的彼德拉·楚教授指出，法国画家马蒂斯在其漫长职业生涯中，多次自非西方艺术中获取灵感。日本版画，波斯和印度的细密画，拜占庭图标和马赛克，中国绘画和艺术理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纺织品，都激励着他的创作。这些不同的异国情调的艺术形式对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渗透在他的创作和他对艺术的思考中，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一个具有代表性和现实的全新思维方式。

来自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音乐系的国际音乐学学会会长蒂尔曼-希巴斯教授，以其独特的视角，在名为“和谐观及其音乐表现”的演讲中指出美好的想法总是在特定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的。只有在两种文化达成一致的美学标准这一特定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一种感觉上的巧合，由此出现文化的同化。对此，他强调最重要的策略是“理解需要了解”。想要更深刻地理解音乐的内容，就需要更深入的了解，无论是音乐家，还是音

乐语言。了解学习其他文化，无论是在音乐、语言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和社会的表达，始终是一件富于积极意思的事。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更多实质性的内涵时，和谐的美感才会降临。

本场学者发言的最后一位是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道新教授。他通过“从‘亚洲的电影’到‘亚洲电影’的发言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亚洲各国创造的电影主要是一种以国别相标识的、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的电影”；但从新的世纪亦即21世纪到来前后开始，亚洲以至全球都在期待一种主要以合作为前提的、文化意义上的“亚洲电影”：这是一种更具亚洲认同感和普世价值观、因而也更有精神包容性和市场竞争力的亚洲新电影，在逐步增强亚洲各国的电影实力以及不断提升亚洲电影的整体形象的同时，改变并丰富了世界电影与全球文化的新格局。

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

“北京论坛（2008）”艺术分论坛简报（六）

11月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论坛艺术分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演讲。

“历史英雄的‘困境’与‘解脱’——从‘林则徐’谈起”，是东京大学刘间文俊教授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林则徐”形象这一有趣个案所展开的专题研究，其分析重点投射于电影《万世流芳》这一长期受到争议的作品。在其讲演中，历史史实的“取”与“舍”、老生戏的“亮点”以及虚构人物的潜台词，成为对这一电影获得理解新纬度的切入点。

“冲突、对话与融合——‘全球化’时代中西艺术文化交流问题的思考”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陈旭光教授就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针对中西艺术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提出的个人思考。毫无疑问，一部艺术史或文化史，是一部不同文化系统、不同文化圈的艺术发生关系的历史，其中充满了碰撞、对立、冲突，也常有借鉴、影响、对

话、对流与融合。在日趋“全球化”的时代，这种交流、对流、影响、对立、同化、融合的方式无疑更趋频繁而剧烈，更为复杂。而“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中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是已同化于一个新结构之中了。”

波兰现代音乐学会主席，音乐学家杰西·施坦基奇教授，在“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克拉科夫新音乐”的发言中，借助音乐文化在克拉科夫的情况，向我们展示了关于这座城市音乐的传统、未来和现在。短短 20 年间，众多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志于现代音乐的音乐家们通过克拉科夫音乐节，成功地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为跨越东西方文化的音乐风景线。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朱青生教授，就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看待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专题，以《当卢浮宫遇到紫禁城》为例，解释中国如何开展一个世界艺术史的研究和解说。报告的主题分成理念和方法两个部分。因为在西方艺术传统观念之外对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重新认识和复兴，使得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引领世界艺术学的理论解释。有了这两个出发点和观点，我们才有从事艺术史研究的清晰思路和独特的方法。同时在中国古代的艺术观念中具有三个基本素质也为理解当代艺术三个基本素质提供了启示。

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俞虹教授在其“电视传播与人类文明共享意义场的建构”发言中提出：当今世界，电视以其极大的包容性、丰富性，展现并创造着生活，更以其特有的便捷和大众化方式越来越多地介入人们的生活，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

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

北京论坛（2008）奥运分论坛简报（一）

11月7日下午，“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分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多功能厅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奥林匹克与世界和平”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演讲。本次论坛由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张剑和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副校长 Song Byung Nak 共同主持。

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教授指出探求跨奥林匹克文化对研究跨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奥林匹克交流扩延了文明的规模，极大地丰富了文明的内涵，北京2008年奥运会实践了世界文明交流的梦想。“和而不同”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特点，人文奥运是筑构北京奥运的灵魂支柱，其人文涵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身，中国也将产生与世界交流的新起点。

英国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詹姆士·曼根教授在他“全世界友好的保证：后奥运遗产”的报告中指出，国际奥委会已经遇到了后奥运遗产的问题。他提醒人们奥运会的遗产不仅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预想之中的，也有预想之外的。任何一届奥运会都会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奥组委在奥运召开的两年后就会解散。国际奥委会全球影响评估因此不能提供一个全面充分、能够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方面的遗产评定。他比较了 2005 年、2007 年和 2008 年权威机构为伦敦奥运会所作的预算，增长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这会给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但是他仍然确信奥运会是一股积极的全球力量。最后他强调今天在这里所作的评判是为了能够带来积极的改变，“如果向错误关上了门，同样真理也被拒之门外。”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任金元浦教授认为北京奥运会提出和展现的人文奥运的理念和实践，意义深远，它所弘扬的和谐世界、和谐奥运的人文精神，是北京对于奥林匹克主义的独特贡献。中国志愿者强大的阵营，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是志愿主义宏伟事业的奠基者。奥运给中国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全新人文面貌的极好的机会。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名誉教授罗贝塔·帕克在她题为“在全球时代从历史中学习：北京奥运会会为所有人带来和谐与繁荣吗？”的报告中强调了奥运会的教育功能，她认为体育，不管源自西方还是东方，都有改善世界各地的孩子、青年人和成人生活的潜能。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郝光安强调了北京奥运会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和不同信仰的人们吸引到一起，超越了政治、宗教、种族和语言的限制，让世界人民共同欣赏体育竞技，交流感受、结交朋友，是进行世界和平教育的一次极好体验。以“和谐之旅”命名的全球火炬接力活动是中国追求和平的体现，但却在一些地方遭遇了阻碍火炬传递、企图熄灭火炬的不和谐的暴力事件，这说明和平的实现需要付出努力和斗争。最后他提到“平安奥运”的口号和实践，既反映了人们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又激起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全国开展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有助于培养公民，尤其是中小学生的世界和平意识。

康奈尔大学的徐昕教授首先强调北京奥运会创造了历史，接着他谈到了一个问题，即北京奥运会在拉近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距离，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方面，是否

发挥了预想的作用？在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之外，奥林匹克文化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通过与奥林匹克文化的接触与接纳，改变外界对中国传统形象的一些偏见。徐昕教授最后引用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女士的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希望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全面地认识西方。

学者们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在本场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员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纷纷表示收获很大。

19

11

7

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 北京论坛（2008）分论坛简报（二）

11月7日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分论坛的专家对话部分，由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教授的主持，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德国奥委会副主席 Helmut Digel，国际奥林匹克学院荣誉院长 Konstantinos Georgiadis，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体育馆运行团队主任张彦围绕“奥运会与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肖天针对“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体育商业化问题”、“运动员的素质教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提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取得 51 枚金牌这一喜人成绩的同时，肖天提醒大家，在一些世界上影响力较大、广受群众热爱的项目

上，比如足球、篮球、网球等，中国的水平并不高。此外，他还列举了国际上体育商业化的成功例子，如世界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职业拳击、世界一级方程式大赛、高尔夫球赛事等，并表示在这类项目上世界发达国家仍占有很大优势。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以及媒体和网络的发展，体育成为一种产业，运动员的价值得到放大。但商业化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要让运动员获得合理收入，但又不能完全去追逐商业利益。关于运动员的素质教育问题，肖天提到要对运动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回报社会，参与慈善事业，关注弱势群体。体育总局在着手进行这些工作，如在奥运会后组织获奖运动员去地震灾区慰问，将拍卖奖牌的钱用来给学生建风雨操场。

Digel 认为中国的“举国体制”是难以在其他国家复制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他随即提出了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在奥运会商业化的背景下，运动员的榜样作用并不都是正面的，如那些为取得成绩而不惜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张彦根据他在奥运会乒乓球馆负责的经历谈到：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证明世界选择北京举办奥运会是正确的决定。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举办奥运会，是推广奥林匹克理想的最好实践。中国老百姓对奥运会成绩的态度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北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前，大家都希望中国运动员拿到更多的奖牌，但是在比赛开始后，尽管大家仍希望中国运动员取得好成绩，但他们也希望世界各国的运动员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当看到瑞典、新加坡运动员的精彩表现时，观众们为之加油助威。张彦副书记在提到运动员的教育问题时，指出北京大学为优秀的退役运动员提供了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运动员勇于拼搏的品质有助于他们在学习上取得成功，吸纳优秀运动员入校还有利于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北京大学着眼于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在未来的时间里将会吸收现役的运动员进入校园学习，使他们在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的同时，又能拿到大学文凭，为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提供条件。

Georgiadis 随后介绍了一项关于奥林匹克教育计划执行情况的全球调查。其结论显示奥林匹克教育是一项受到广泛国际承认的有创新性的教育活动。除国际奥林匹克教育学院外，现在有3个国家级的奥林匹克教育学院。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国际奥林匹克学院没有制定统一的要求

各国都采纳的教育方案。

在结束专家对话前，主持人请四位嘉宾围绕本次对话的主题，用一句话进行了概括。

肖天：“运动员，尤其是金牌运动员，应该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出发，更加全面的发展”。

Digel：“奥林匹克精神是诚实精神的体现”。

张彦：“人类创造了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精神改变了人类”。

Georgiadis：“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我们可以预见到，奥林匹克精神将在全球得到更好的发展”。

20

11

8

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

北京论坛（2008）分论坛简报（三）

11月8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论坛“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分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奥运会与文化”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演讲。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詹姆士·曼根教授和北京大学董进霞教授作为主持人组织了这场报告会。

首先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 Helmut Digel 在他的题为“全球化世界的体育视野”的报告中首先通过他个人的经历指出体育正在逐渐成为人类的终身伙伴，从幼儿园直到九十岁时的运动。他分析了体育以及体育所处的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所有和过去有关的

事物都在被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一个以信息和科技为基础的社会转变过程中，个人化、理性化、法制化、全球化越来越凸显，经济、媒体、科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关注了体育在这些变化中所显现出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如体育的市场化、性别冲突、环境问题等等。最后他指出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对人们社会心理的康乐有着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张锐教授在报告中首先阐述了 2008 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中国与全球沟通无限的深远意义，为了达到和世界人民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无限的目标，北京人、中国人为更好的展示北京的时代特点和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奥运准备工作。张锐教授选取了在奥运会准备工作中，最被国际媒体关注和重视的三个方面——“天、地、人”来阐释北京的可喜改变。最后她提到奥运会前中国遇到的一些灾难和困难，雪灾、地震、西藏反动分子的打砸抢等事件并没有挡住中国人坚定的步伐。多难兴邦的激励，使国人为世界呈现了一次完美的奥运会。

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教授 Susan Brownell 的报告关注了奥运会的举办是否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相互理解作出了贡献。作为在西方进行中国体育研究，且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学者，她讲到了自己在奥运前后与中西方媒体打交道的经历，她指出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存在着很多的误解甚至是偏见。她强调中国要想更好地表达自己，英语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清华大学仇军教授的博士生钟建伟代其发言，强调了在讲求世界和谐，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的今天，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传统的重文轻体思想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具有阻碍作用、传统文化中共性至上的原则不利于个性的充分发展、奥林匹克的竞争进取精神与中国传统贵“和”尚“中”的持中哲学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奥林匹克文化的单面性与中国欲为其做出贡献的良好意愿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因此，对待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我们应以“和而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去审视，从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

北京论坛（2008）分论坛简报（四）

11月8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论坛“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分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奥运会与文化”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演讲。第四场报告会由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张剑主持，这一节的讨论热点集中在法制奥运与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围绕着“中国后奥运时代的体育发展”展开。

西安体育学院的党委书记董小龙教授认为奥运为我们带来了奥运仲裁，奥运仲裁的成功发展让国家司法主权无形中做了让步，在法律环境上基本实现了地球村的理想，北

京奥运所要面对的体育仲裁法律问题其实主要是如何传承这种传统。对北京 2008 年奥运会所发生的纠纷，我国既可依承认并执行奥运仲裁的裁决国身份，也可依仲裁地国的身份，对奥运仲裁行使司法监督权。在监督审查的同时也是一种学习，我国体育仲裁制度可以借鉴奥运仲裁模式，在大型运动会上设立临时仲裁机构，并制定体育仲裁特别程序来处理该运动会上的一切争议。

于善旭教授同样认为法制奥运应在体育界和法律界得到更多的关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和谐体育与和谐世界，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置身于现代民主法治背景下兴起与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但有着与法治同一的精神追求和深刻内涵，而且适应并运用现代社会的法治架构，建立了法治化的运行模式，形成了法治奥运的发展趋势。北京奥运会是对法治奥运的生动彰显。

在经历奥运会成绩顶峰之后，中国的竞技体育将向何处去，是每个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毛振明先生的演讲切中时弊，对中国体育体制现状以及未来走向做了整体的思考。在他看来，现有的体制暴露了很多问题，如运动员培养成本高、文化素质低、退役后就业出路窄、和学校体育、群众体育脱离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源于我国的体育人才长期脱离常规教育体制，在一个与之平行的体校体制中培养所致。面对这个现状，毛振明先生提出了一种“新举国体制”的设想，其基本思路是将体育人才的培养重新纳入教育主渠道，让竞技体育向教育体系回归。这正是发达国家竞技体育的一般模式，中国高校也曾经这么做，现在正重新开始这一实践。从可行性讲，回归教育体系符合学校、运动员、教练员乃至普通学生的多方利益。毛振明最后强调，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实力，与国家综合国力、人口总量及其素质、体育传统与普及程度和国家支持力度均有关系，但其中国家的大力支持对竞技体育成绩的提高效果最为直接而显著。我们必须坚持举国体制，但也不能因此而回避其中存在的问题。

在下面的专家讨论环节中，听众对于毛振明教授提出的新举国体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向他提问。毛振明教授就体育总局的未来发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不管体育总局的职能如何改革，都需要这样一个部门对我们的体育进行指导协调，但是其改革的重点要放在：对哪些方面进行指导，如何把我们运动员的培养关系理顺；针对有观众提出的竞技体育怎样与教育系统相结合的问题，毛教授认为，可以把竞技体育系

统纳入中小学、大学中去，发展体育的经费划拨由教育系统负责，将各专业运动队分配到各大高校，由高校根据运动任务争取经费。针对大家对举国体制提出的质疑，他表示：完全支持 50 年以来的举国体制，没有举国体制，就没有我们关于奥林匹克的讨论，这 50 年来发现的错误，需要全国人民一起努力解决。

张剑司长在最后的总结中谈到，中国体育问题的实质是体育的社会价值问题，是奥运夺金与发展大众体育如何平衡的问题，体育总局在决策过程中其实也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处境。此外，还有必要辩证的思考体育的效益问题，不仅要考虑比赛成绩，还要综合评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的获得。

22

11

8

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

北京论坛（2008）分论坛简报（五）

2008 年 11 月 8 日下午分论坛整体围绕着“奥运会与社会发展”的主题讨论。在北京奥运会研究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学者 Susan Brownell 教授和上海大学陆小聪教授作为主持人首先组织了第一场报告会。学者们关注了奥运会的价值观在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来自宾西法尼亚大学的 Mark Sanford Dyreson 教授首先介绍了美国社会对于北京奥运会的一些解读，如中国以金牌榜来排定此次奥运会的次序，而美国用奖牌榜来排定名次，中美分别在自己的排行榜中名列第一。他指出奥运存在着“美国化”现象，而美国化是通过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电影等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来实现的。他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将自行车越野项目作为正式比赛项目为例说明这项运动代表着加利福尼亚的价值观：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沈大力教授发表了题为《彼埃尔·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的核心价值观》的主题演讲。他讲述了在法国巴黎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话的感受，巴黎一小撮人叫嚷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噪音，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法国人的心声。他们之中确有些人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缺乏了解，但并不赞同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政治化，更反对藉此侮辱 13 亿中国人民，认为这也有失法兰西民族的尊严。他认为《奥林匹克宣言》强调了人类身心和谐的重要意义，应该寻求奥林匹克之“道”，即以我国道教、儒家和佛教“三合一”思想体系的“道”为核心，深层透视奥林匹克主义。沈教授强调我们不要片面理解“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认为“更快”就是跑得更快，“更高”一定是跳得更高，“更强”当然就是角力时表现得更勇猛之意，实质却不然，此话最早出自一位修士之口，必然带有神学色彩，意在让人心归天主，强调的是精神而非物质。沈教授希望届奥运会能办成顾拜旦男爵所希冀的“人类春天的盛大节日”。

东京大学的学者能登路雅子指出，政治一直是奥运会的一部分，许多国家和群体都运用奥运会以及传媒的关注来发表他们特定的政治主张、种族问题、民族问题和性别问题都是现代奥运会的议题。

来自哈尔滨大学的刘忠武从高校体育指导思想的转变、职能转变和体育课程的变化三方面说明了奥运为高校体育改革带来的深刻影响。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 Emilio Fernández Peña 教授发表了题为《奥林匹克研究，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与世界的和谐》的主题演讲。他首先指出了体育的文化维度，接着又分析了作为文化现象的奥运会，指出了文化不是奥林匹克的价值而是核心价值。他在报告中还强调了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体育赛事的解说者，而是共同创造者。

维也纳大学的 Wolfram Manzenreiter 教授发表了题为《次级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变化

中的远东想象力》的主题演讲。他首先指出奥运会和东亚的互动体现了一种矛盾。自从奥运会第一次来到远东次大陆，对于奥运会这种全球一致的价值观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采用 Spivak 的“次级”（Subaltern）的概念来说明“一切只能部分或者无法达到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东亚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经历为“次奥林匹克”（Subaltern Olympics）的研究提供了案例。

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阿不生雄教授的发言可以说和 Manzenreiter 教授的发言一脉相承。他在做中学校长的时候每天向中学生们介绍和解释有关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格言和谚语，发现这种活动对于激励中学生的抱负非常有效。也许在一般人眼中东方的柔道与西方的奥林匹克毫不相干，但阿部先生通过日本柔道精神价值表述的不断变化以及与顾拜旦先生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表述进行类比，说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共性，那就是运动不仅是一个健全身体的过程，而是要通过努力、自省，做到正义和进步的过程。

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

北京论坛（2008）分论坛简报（六）

2008年11月8号下午分论坛的第六场报告由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 Helmut Digel 和王童先生共同主持。

在高校体育教育的建设方面，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系主任孙麒麟以“坚持‘健康第

一’教育思想，构建大学体育发展新体系”为主题，从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体育相结合，体育的普及与提高、科研与教学训练相结合等角度，系统而丰富地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体育教育的发展模式，提供了综合性大学体育学科建设发展的新思路。而吉林体育学院的副院长宋继新站在体育院校的角度，认为要充分认识到奥运追求教育和秩序的价值理性，以此构建“夺标育人，和谐世界，为国争光”的和谐竞技文化；并主动变革竞技思想及运动员的培养方式，从而实现人在竞技中的解放，这将为建设国家先进的竞技文化提供某种理论参考。

里昂大学的 Thierry Terret 教授以 1968 年格勒诺布尔冬奥会为例，说明奥运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冬奥会收入盈余，媒体报道较多，法国成绩也不错，但与预期相反的是，即使有一些吸引人的旅游项目，旅游业却并没有大幅增长，那些旅游者往往是来欣赏自然风光而非来滑雪。而对法国冬季运动的促进，也只是昙花一现，更糟糕的是，滑雪发展的饱和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给普通民众造成税务负担，其结果可能使穷人更穷，一些基础设施也废弃了。最终，城市贫富分布不均衡等矛盾越发突出。当然，城市形象通过奥运会的确有所提升，但这似乎不足以解决上述的问题。Terret 先生归结为一个看似悲观的结论：举办奥运会不会自动给我们带来经济利益。

哥本哈根大学的 Gertrud Ursula Pfister 教授概括地介绍了女子进入奥运会的历程及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她认为到目前为止，女性尚未完全统一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女性在奥委会的领导层的比例也一直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女子参加奥运会的项目以及取得成绩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力。这一点，对于穆斯林妇女来说尤为重要。她强调事实上，穆斯林女性可以找到宗教仪轨、服装和参与体育的平衡点。而国家支持等因素对女性参与体育具有莫大帮助。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小聪教授以“奥运会与社会认同”为主题，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提出社会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建构不同民族国家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在体育比赛中，人们通过国旗、语言、文化、肤色、习俗等来区别彼此，来获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的认同。根据相关的调查研究，体育在所有能引起对国家成就自豪感的指标中的比例位居第一。因此，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不仅弘扬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崇高理念，也对增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提高社会整体的

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南非斯坦林布什大学的副教授 Scarlett Cornelissen 指出，应该这样来理解发展中国家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兴趣：赢得体育大型活动的主办权，使发展中国家可以投入相对有限的现有资源，与更强大的国家展开竞争，去展示文化特色，自然资源，或战略性地宣布自身国际地位的边缘化和被排斥。

来自韩国的学者 OK Gwang 发表了题为“热爱体育的国家：88 年汉城奥运会的文化遗产”的演讲。他提出韩国现代体育的高潮是 88 年汉城奥运会，它可以被视为全球性的体育运动，社会文化转型与政治意图的产品。汉城奥运会一直被当作是国际上举办大型赛事的典范，汉城奥运会改变了整个韩国，对于提高韩国的国家认同和韩国现代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

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

北京论坛（2008）分论坛简报（七）

11 月 9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北京论坛“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分论坛上，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奥运会与主办城市”的主题发表了各自的演讲。本场报告会由康奈尔大学的徐昕教授和北京大学张锐教授主持。

来自延世大学的韩国学者 Jin Ho Kim 从东西方对奥运会的不同理解上阐述了和谐对于中国的意义，他提到尽管和谐社会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儒家的概念，但整个中国社会却更有道家的气质。他强调中国和其他曾经举办奥运会的东方国家一样，希望通过奥运会传达信息给世界，他特别指出他注意到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不像是一首奥林匹克歌曲，西方人有时很难理解太富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奥运会。

来自澳大利亚詹姆士库克大学的 Peter Alan Horton 教授讨论了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良好合作关系的性质，在中国获得了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权后，澳大利亚对北京加入 WTO 和将要举办奥运会都表示了祝贺。北京奥运会要展示中国日益开放的经济和国家实力，同时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和中国进行更多合作的机会，促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的伙伴关系。体育作为一个跳板，加强了中澳的联系，然而仍然有一些阻碍存在，在澳大利亚国内也有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暗流涌动。

北京体育大学黄亚玲教授在演讲中提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奥运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来自希腊爱奥尼亚大学的 Helen Niki Angelomatis-Tsougarakis 学者向大家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 19 世纪希腊复兴的情况。她提到 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结束后，立即开始了关于希腊的奥运会永久举办权的讨论。为了找到一个解决国际奥委会的反对的办法，有人建议，在其他国家举行奥运会的四年间隔里，由希腊在雅典也举行一次奥运会。这项建议并没有被国际奥委会的顾拜旦所看好。1906 年 4 月 9 日开始，共历时 10 天，在希腊进行了一届这样的奥运会。在当时，这种奥运会被认为是官方的，并且有杂志出版了这次奥运会的获胜者名单。然而，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被列入现代奥运会的正式名单里面。98 年后，雅典再次举办奥运会并获得了成功，希腊再次举办奥运会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香港浸会大学的刘永松副教授报告了他的一项关于中国两岸三地的中学生在北京奥运会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国家认同的调查。目前完成的第一阶段研究显示了奥运会

前内地的中学生国家认同程度最高，其次是在内地出生的香港学生，再次是香港本地出生的香港学生，最低的是台湾学生。

来自日本迪桑特集团的户井田朋之先生，围绕着奥运经济与体育市场的主题展示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他通过详实有力的资料和数据分析了近年来的 12 届奥运会（包括夏季和冬季）的八个指标，提到了北京奥运会在七个方面达到了历史之最，包括有历史上最多的国家首脑出席了开幕式等。他展望了中国后奥运时代的经济之路，谈到很多奥运会在举办之后当地都出现了经济下滑的现象，希望中国能够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应对新形势下面临的课题和挑战。

北京大学的董进霞教授以“北京奥运会：国家地位，运动成绩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进行报告。她认为 2008 年，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出色的竞技成绩，提升了国际形象，展现了一个自尊和受人尊敬的中国。中国不遗余力地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国家认同。从政府到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水平来支持北京奥运会反映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不管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奥运会不仅是梦想的实现，而且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

在专家总结部分中，Helen 教授提到，奥林匹克精神对于提高国家认同，发扬国家精神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这却不是国际媒体关注的重点；另外，商业化过多的涉入体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体育的竞争与和谐；各个国家对奥运会主办权的争夺过程，也牵涉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黄亚玲教授说，归属感对于国家来说是重要的，在当今社会，各个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大的归属感，一种大世界观。

9

英国学者曼根教授强调，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就像我们在韩国、中国、英国所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今天的奥林匹克运动；他祝贺了此次北京论坛奥运分论坛的成功举办，祝贺北大，祝贺中国，祝贺东方！

最后，负责本次分论坛工作的北京大学董进霞教授向来自 13 个国家的学者表示了

感谢，感谢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以及到场的各高校的师生。并进一步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国已经通过举办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形象，中国期待着在未来对世界的新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
“北京论坛（2008）”国际关系分论坛简报（一）

2008年11月7日下午,3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了以“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为主题的北京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的研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和莫斯科大学的维克多·库瓦丁(Victor Kuvadin)教授主持了第一场的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地,会议紧紧围绕“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这一主题,就全球化、区域主义、后冷战时代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充分的交流与热烈的研讨。

(一)全球化问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于子桥(George T.Yu)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全球化”这一术语相对较新但并非新现象。进入21世纪后,无论从范围、力量、速度还是影响方面,全球化都已大大增强。新技术的发展、各国间联系的增强以及多边组织机构的参与都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也使得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全球化还遭遇到本地化的挑战,出现了“全球本地化”的特点,进而呈现出全球化的多样性特征,这也表明,全球化并非属于某一种道路或单一模式。墨尔本大学的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教授则从知识经济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化的另一层面——全球公共领域。他认为,世界在保持政治、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正日益成为一个单一的交流地带和知识大仓库。知识经济是通过知识而非经济进行融合,但是由于民族利益和民族政策的原因,世界发展也变得愈加不稳定。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社会文化研究科教授山胁直司(Naoshi Yamawaki)则主张用“全球地方性”(glocal)的公共哲学来区别于民族的和全球的公共哲学,这一理念的实施可以避免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中心主义带来的弊端。

(二)区域主义。韩国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系教授林白赫(Hyug Baeg Im)就全球化时代的东亚区域主义面临的障碍、机遇和前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冷战期间,由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辐射网络的存在,东亚区域主义的建立是不可能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的瓦解、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处于工业化和巨大转型时期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东亚区域主义新的历史阶段。

(三)后冷战时代的分析。特立尼达的西印度大学历史系教授陆华祖(Walton Look Lai)从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极端年代》四卷本、《新世纪》(*The New Century*)、《论帝国:美国、战争及全球优势》(*On Empire: America, War and Global Supremacy*)

和《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Globaliz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等著作的解读来分析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的新变化。他主要从冷战的终结、世纪之交的战争与和平、苏联的解体、西方世界的左翼现状以及全球化和现代世界经济等角度分析。日本成蹊大学教授加藤节(Takashi Kato)则从民主和民族主义的视角分析后冷战时代。他对民主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概念进行历史性考察,认为它们在冷战期间被意识形态化,从而在本质上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主被分为所谓的自由或者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或人民民主,这一划分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受到诸多挑战,而欧盟将其宪法、议会制度的制度化的努力也对民主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课题。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贡特·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探讨使西方更安全的国际秩序。北京大学教授戴行钺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发言中,谈到当今中国应避免极端民族主义给中国发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四)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使人们比较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以“资本主义可否持续”为主题谈到资本主义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效地控制消费和发展,民主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应该取代自然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民主的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稳定性和环境的保护更有保证。施韦卡特认为中国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不要学习西方的能源模式、消费模式,避免走西方的弯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乔纳·利维(Jonah Levy)通过对法国经济政策的变迁的历史梳理,提出法国经历从统管国家到社会感缺失国家的发展历程。提出增加对失业人员的培训、改革失业制度以及增加沟通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性。

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

“北京论坛(2008)”国际关系分论坛简报(二)

2008年11月8日上午，北京论坛（2008）国际关系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和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吉列尔莫·贝莱斯(Guillermo Ricardo Velez Londono)主持，与会学者集中就全球化、政治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是与会学者比较关注的话题，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探讨：第一，全球化的后果。前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Takeshi Sasaki）教授将前一阶段的全球化特征总结为经济快速增长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拓展。他认为全球化至少带来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一，全球市场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增长刺激了消费，导致石油、原材料等物价飞涨。由于食品短缺，贫穷的、资源匮乏的国家将面临政治和社会危机，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不经工业化阶段而在短时间内变得非常富有。次贷危机对美国的信用制度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造成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市场和国际政治的动荡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其二，全球市场的深化造成权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减弱，从而对全球金融市场变得敏感而脆弱。其三，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政治化。经济全球化不但对人们的生活内容和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且还导致了“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民族主义的问题。其二，全球化对地区发展的影响。马来西亚国民大学教授 K.S. 内森（K.S.Nathan）谈到全球化对东南亚的文化、政治和战略的影响。他认为，东南亚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折射出全球化对这一地区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影响，而伊斯兰宗教的全球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尤为值得重视。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阿德勒·吉纳杜（Adele Jinadu）则就全球化对非洲国家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全球化和非洲国家的独立特性存在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做四个方面的努力：其一，强调新的非洲中心认识论（Afrocentric Epistemology）；其二，强调用恰当的术语来描述非洲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其三，探寻新的路径提高全非洲的国家能力，加强集体主义的能力；其四，基于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对民主的概念重新界定。

（二）政治发展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锡镇教授以泰国为个案对东南亚的民主政治发展进行分析。他认为，根据东南亚实行权威主义民主的成功经验和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失败教训，未来泰国所需要的是权威主义民主，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只

有这种民主才能有效地推动泰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否则，泰国将落后于其他东南亚国家。要实行这种民主，就需要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鼓励大党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教授梳理和总结了“第三波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特点：其一，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其二，政治改革不断深化；其三，传统政党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四，拉美左派东山再起；其五，政党政治的地位在上升；其六，“民主疲劳症”积重难返。他认为，影响拉美政治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有腐败问题，军人干政和社会问题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鲁斯·B.科利尔（Ruth B. Collier）以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为例，对冷战结束拉美的利益体系的变化进行分析，认为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较低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反映。她还就上述四国的政权特点进行了分析。另外，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穆罕默德·萨利穆（Mohammad Selim）教授则从阿拉伯的视角来看待阿拉伯改革进程中的国际化。他认为，西方大国罔顾阿拉伯世界的实际情况，试图通过全球化改革议程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改革，这是应该抵制和反对的。

“北京论坛（2008）”国际关系分论坛简报（三）

2008年11月8日下午，北京论坛（2008）国际关系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前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佐佐木毅（Takeshi Sasaki）教授和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教授主持，与会学者集中就中国的政治发展、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中国的政治发展。如何看待30年中国的政治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哪些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在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已经面临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这一约束提出了如何转变中国现有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最终如何转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为此，中国的政治体制面临四个方面刻不容缓的任务：其一，扩展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其二，必须结合中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实践，创造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过程的新形式；其三，政府必须确立为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必须完成的阶段性的任务；其四，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为这种新的政治模式提供“第一推动”。韩国汉城大学国际大学院赵英男（Young Nam Cho）教授通过对在中国进行的中国特色民主的讨论和过去30年政治改革的总结，结合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治体制研究得出结论：其一，虽然各个国家及地区民主化的方式不同，但民主的内容比较相似，但不应以民主化过程的多样性（特殊性）来否认民主内容的普适性；其二，中国也在实施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而不是独具中国特色。与会的一些学者对其这一观点并不认同。

（二）中国的外交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赵宝煦先生在题为“‘和为贵’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在2005年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断的努力，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拥护和平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由战争所带来的民族屈辱和战乱之苦，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珍视“和为贵”的价值理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教授则认为，中国应继续坚持自己的国际战略，即应继续坚持我们的国内建设和改革，在发挥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也要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发挥作用。同时，就新时期中国外交体制的充实、调整和转型，他提出若干选题和思路：其一，外交变革的大背景与大趋势；其二，外交方式（DIPLOMACY）自身的丰富、提升和完善；其三，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作用；其四，外交中的危机预防与管理机制；其五，外交的民族特色；其六，外交教科书的“遗失”现象；其七，中国外交的前瞻性课题。

（三）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与会学者就中美、中德、中韩、中欧、中国和大洋洲各国和地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中德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连玉如教授在谈到中德关系时指出，近期中德关系面临极大困境，中德“天然盟友”关系的论点受到质疑。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两国必须重视各自的重大利益，不要挑战对方核心国家利益，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注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2) 中美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永成认为，中国的安全软环境近些年来已经有所改善，体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9·11”事件发生之前，中美关系一度紧张，“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协调和防核不扩散合作的需要，积极调整了对华政策，对华战略认知从“战略竞争对手”转变为“利益攸关方”，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战略基础由此得以夯实，中国的安全软环境有了相应的改善。

(3) 中欧关系。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GIGA）舒君德（Guenter Schucher）教授分析了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承认中国并向中国开放市场；第二个阶段，加速经济合作；第三个阶段，现实主义、竞争和伙伴关系。他认为，中欧间关系正在逐步加深，当然，中欧之间也存在其他问题，比如武器禁运和价值观外交等。对欧盟来说，必须要协调各个成员国内的利益和政策，通过统一政策实现欧盟的更高的合法性和国际性，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和欧盟关系的发展。

(4) 中国和大洋洲各国的关系。亚太国际教育协会理事、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亚太研究院学术事务主任埃德加·波特（Edgar Porter）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了大洋洲的重要作用，把大洋洲纳入自己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太平洋岛屿原住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介入持积极的欢迎态度。因为，不论他们的国家大小、资源多寡、政治制度的差异，在同中国打交道中，他们都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大洋洲与日俱增的影响丰富了这一地区的领导人进行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

(5) 中韩关系。辽宁大学崔日明教授在谈及中韩关系时认为，中韩两国已具备组建中韩自由贸易区（FTA）的基本条件，中韩两国应抓住有利时机、扫除障碍，加快 FTA 的组建。

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

“北京论坛（2008）”国际关系分论坛简报（四）

2008年11月9日上午，北京论坛（2008）国际关系分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会议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李鸿永（Hong Yung Lee）主持，与会学者就美国政治、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中国的对非援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美国政治。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动荡以及美国大选无疑是此次参加北京论坛诸多学者比较关心的话题。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里克·斯切克勒(Eric Schickler)教授从政党极化（Party Polarization）的视角分析美国政治。他认为，在过去的25年间，美国的政党极化现象的出现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斯切克勒教授指出，有些人认为只有强势政党才能有效地制定政策，而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政治结合的结果是不能有效地制定政策，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政党极化的增强和党内的斗争阻碍了立法进程和政策的制定，他期待奥巴马政府能够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有所进展。

（二）美国的亚洲政策。在过去的八年中，布什政府把中东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重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罗德明（Lowell Dittmer）认为，在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人口因素、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政治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亚洲正在崛起。因此，罗德明认为，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美国应该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

（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安山教授从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理念和行动视角，探讨中非关系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南南合作。关于中国对非援助的理念，他认为，从1995年以来，中国对非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逐步完成了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共赢的三重转变。从行动上讲，中国对非援助大致有以下方式：无偿援助（包括人道主义援助）、援外项目合作合资方式、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中非发展基金贷款、援非医疗队、人力资源开发和发展经验交流。通过中国对非援助的理念和行动的分析，不难得出中国

对非援助的原则：平等相待与互相尊重、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不附加政治条件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强调培养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李安山教授认为，中国在援非过程的理念和行动，为南南合作提供了较好的范例。

研究型大学圆桌会议：国际合作与大学发展

北京论坛（2008）教育分论坛简报（一）

全球化时代的研究型大学思考

2008年11月7日，第五届北京论坛——北京论坛2008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拉开帷幕。下午两点，本届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型大学圆桌会议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四季厅隆重举行。鉴于近年来全球化对大学教育的重要影响，本次会议着重探讨了国际合作与大学发展的重要关系及其可行途径。

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四十余位高校领导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北京大学许智宏校长、蒙特利尔大学 Luc Vinet 校长、首尔国立大学李长茂校长、清华大学胡显章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Michael McRobbie 校长、印度尼赫鲁大学 Yash Pal 校长、巴塞罗那大学 Maria Del Mar Campins Eritja 副校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Ian Chubb 校长等等都就各自学校在大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领域关心的问题与取得的成就发表了精彩的报告演说。

加强大学间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与世界多所大学建立战略型伙伴关系来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学习经验与视角，一直是世界一流大学所重视与追求的目标。近年来，随着全球性事物的增多，国际间合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密态势。虽然众多学者对于国际化的影响有着褒贬不一的态度，但是不可否认国际型人才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大学培养目标。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世界各大学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建设属于自己的国际性教学交流平台和研究项目，将确立国际化战略列为高等学校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来自韩国、加拿大、西班牙、德国、美国及法国的大学校长都认真地向与会代表们分析介绍了所在高校的留学生情况、国际交流项目的运行状况和经验，以及有待提高或解决的问题，如高品质课程体系的建设、机构内外合作的差异与互补性、国际合作的政策的具体实施标准等。其中，北京大学作为北京论坛的主办方，有责任向世界各国介绍自己的培

养模式与发展目标。校长许智宏院士在展示了北大已实现的国际合作性教学研究与学生交流方面的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未来的北大，或者说由北大所代表的中国一流高等教育主体将选择的发展方向。而清华大学胡显章教授则更为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学未来课程体系的改革，尤其是通识教育的建立与普及问题。胡教授指出了中国本土文化对于自身高等教育培养方式存在着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认为我国的大学通识教育既要借鉴欧美大学的可行之处，又不能忽视我国现实的文化发展的能力状况与社会需求。

会议时间虽长达三个多小时，但每一位参会人员都对“同行”们的思维与现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全神贯注的关注着每位发言人的精彩之处。许多校长与学者都在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交流领域，积极开展不同学科间层次多样的国际性合作。在所有的发言人中有两位校长的独特观点令人十分难忘。一位是印度尼赫鲁大学校长 **Yash Pal**，他在一定程度上辩驳了大学只注重不断开放、加强交往的观点，并提到文明的价值与作用是发生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大学不仅要重视学术研究与创新，更要思考如何正确地保护我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并教会学生真正理解文明的含义并以此为生活。另一位，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校长 **Paul Johnson** 教授则向大家说明了留学问题的另外一面，即现在国际学生的主体都是中国、印度等亚裔学生，欧美地区的学生出国留学或交换的意愿仍然很低，尽管他们更需要了解世界的其它部分。因此怎样提高其他国家的大学对欧美学生的吸引力就成为未来大学将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同时，学生的国际化只是大学国际性能力的一小部分，真正应该重视并提高的是大学人力资源的国际性流动，尤其是加强青年科研人员的国际交往，并制定一个区域覆盖面大的共同的学术条约，如统一学分制，以此来最大程度上减少国际性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另外，在大会讨论时，来自非洲尼日利亚的代表诚恳地向论坛主办方提出了几点建设性的意见，包括在以后的校长圆桌会议上增加非洲参会人员的发言名额、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创造更有利的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与平台等，使听众们真切地感受到非洲大学教育的意识复苏。

正如大会主席 **Ian Chubb** 教授在最后总结陈词中提出的，“我们努力建设的大学是以未来的研究，尤其是未来的孩子们能够享受最好的教育为目标来奋斗的。我们要为下一代们准备知识与环境，让他们能够比我们更快更好地了解怎样看待问题与解决问题。”

这也正是研究型大学校长会议的目标所在。

北京论坛（2008）落下帷幕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2008年11月9日上午，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为主题的第五届“北京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闭幕。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先生出席闭幕式并发表讲话，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金在烈先生分别致辞。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平、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岩松等出席了闭幕式。仪式由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主持。

闭幕式上，沙祖康先生首先就北京论坛（2008）的成功举办向北京市政府、北京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等主办方表示了祝贺。他表示，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涉及哲学、经济、艺术、历史、生态等多个领域。这些话题和讨论丰富了思想，密切了协作，有助于共创美好生活。

讲话中，沙祖康先生介绍了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三个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他表示，在促进跨文化交流，达成谅解和宽容、实现和谐与共同繁荣等方面，联合国的工作理念和北京论坛主题有诸多共同之处，自由、平等、和谐共荣、共担责任等思想在北京论坛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沙祖康强调指出，事实上跨越国际的并不是只有争端和冲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在致辞中表示，北京论坛举办的宗旨是为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创造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的平台，以增进相互的理解和共识、实现文明的和谐

与共同繁荣为宗旨。作为 2008 北京奥运会后的一次人文社科盛会，北京论坛（2008）延续了奥运会所代表的平等交流、共求和谐的追求，对全球化时代文明的普遍价值这一命题做了全方位的探讨。本届北京论坛规模宏大，与会知名学者众多，论题广泛，发言精彩。各位学者在本届论坛上的学术贡献必将在国际学术界引起积极的回应，加深国际社会对“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的认识，从而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做出重要的贡献。

许智宏院士指出，回顾北京论坛五年来的历程，友谊在这里得以增进，思想在这里孕育成熟。五年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同时也是新的起点，北京论坛将一如既往地关注与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议题，将关注人类的前景与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共同繁荣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从而为和谐世界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金在烈先生在致辞中对主办方北京市政府、北京大学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北京论坛是一个广阔的、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加入了很多信息和新的理解。北京论坛的成功举办离不开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与付出，希望北京论坛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够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文明的和谐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今年的北京论坛围绕“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这一主题，共设“生态文明：环境、能源与社会进步”、“传统与现代的国家建构与政治文明”、“艺术的超越与文明的发展”、“奥林匹克精神与世界和谐”、“世界政治变迁与文明的互动”五个分论坛及“国际合作与大学发展”圆桌会议。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在六个分论坛的 20 多场次的专题讨论中，中外学者依托北京论坛的学术平台，围绕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发展趋向问题发表真知灼见，并产生了诸多思想的共鸣和丰富的学术成果。

会议宣布，第六届“北京论坛”将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论坛（2008）闭幕式特邀嘉宾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先生与北大师生座谈

2008年11月9日上午，北京论坛（2008）闭幕式特邀嘉宾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先生与北大师生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沙祖康先生与参加座谈的师生们分享了自己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的精彩见闻和亲身经历，以及在联合国任职的感受与体验，并就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自由讨论阶段，在场的师生就当前国际热点问题进行了踊跃提问，沙祖康先生对问题一一作了精彩回答。座谈会持续两个小时，气氛活跃而轻松，沙祖康先生风趣幽默的语言引来了现场的阵阵笑声，其话语中透露出的智慧给现场听众带来了无尽的启发与思考。

座谈会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志攀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际合作部部长李岩松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后，沙祖康先生出席了北京论坛（2008）闭幕式，并发表了演讲。